

□许志杰

印象中旧时文人很有风骨、风度,不与一般人一般见识,一般不会掺和尘世凡人的杂七杂八。当然这可能与本人阅历不足、孤陋寡闻、层次不够有关。近读《马寅初年谱长编》,里边的很多故事使我的观感改变不少。

1919年4月下旬,刚刚当选北大教务长的马寅初,遭母亲去世之悲苦。消息传到北大同人耳中,无不痛心悲悯。于是,当月25日,蔡元培、胡适、沈尹默、徐宝璜等人联合在《北京大学日刊》发出启事:“马寅初先生遭母丧,本校同人拟赠聘仪者请送交学生储蓄银行代收,现定于本月底截止。”

其他人不说,单凭蔡元培先生当时担任北大校长之职,其参与发起这件事,很令人另眼相看。蔡先生治校有方,在学生和老师中威望极高,大概与其不摆官架子、平易近人有很大关系。5月2日,徐宝璜就马太夫人聘仪事,再在《北京大学日刊》发启事:“本校同人送马寅初先生太夫人之聘仪,截至四月底,由学生储蓄银行经手,共收到现洋三十五元正,票洋一百八十六元正。除照前送胡适先生太夫人聘仪之例,酌留现洋二元以酬行员经手之劳外,业已全数由弟送交马先生收受。兹将详单开列于后,请同人鉴核。如有遗漏之处请函知以便查明。”三天以后,马寅初在《北京大学日刊》发答谢函:“家慈之丧,承本校诸先生赐唁,铭感无已。返京后,以校务纷繁未暇一一踵谢良用歉仄,谢帖上为本校差役妄填诸先生官印,致于非礼尤深愿。特登报声明。”以礼还礼,礼尚往来,符合中国人的规制礼数。

时过不久,9月25日,蔡元培、马寅初等人联名致函北大教职员,称:“本校朱蓬仙教授(宗莱)因病逝世,身后萧条,同人等欲致送聘仪者,请于十月十五日以前送本校会计课代收,以便汇送,至切公谊。”此函同样发在《北京大学日刊》上。朱蓬仙,名宗莱,曾留学日本,浙江海宁人,与鲁迅、钱玄同一起在日本听章太炎讲课,故为章门弟子,返国后与沈尹默同任北大预科教授,可惜时间不长就病逝,身后萧条。发生在这位朱先生身上的还有一个令人无奈的故事。当时北大开设《文心雕龙》课,本不是朱先生要教的课,因无人可顶,朱先生硬着头皮走上讲台,结果生疏之下被傅斯年的同学听出很多差错,无奈半途而废。即便如此,蔡元培、马寅初等北大教授在朱先生病逝之后,依然向全校师生员工发函,为朱先生送上最后一程。可见,当时名教授荟萃的北大,虽然不时因见解不同而产生一些争执,在人情世故方面还是充满温情,感人心扉。在徐宝璜处理完马寅初母亲之后事致学校同人的函中,我们发现之前胡适先生的母亲也是刚刚去世,同样得到北大师生员工之聘仪。看上去,此类事情的处理,在北大是有先例可循的,做到一视同仁,而且操办这事不是某几个人,而是学校的学生储蓄银行和会计课(科)都参与进来,为大家服务。具体操持的人还会“酌留现洋二元以酬行员经手之劳”,有理有节,得体妥帖。

中国的文人自古以来便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,他们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和为人处世的标准,不在其中恐怕难以理解这些文人的心境和情绪,以及更加独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。打开文人群体这扇大门,其实我们会见到与想象并不一致的



▲1920年,蒋梦麟、蔡元培、胡适与李达钊(从左至右)在北京西山卧佛寺合影。

【文化杂谈】

旧时文人的人情世故



方令孺



梁实秋



胡适

情形,甚至有颠覆认知的奇闻逸事。比如蔡元培和梁启超,一个教育界顶流,一个学术界超级大咖,二人可都是喝酒高手,蔡元培几乎天天来一壶,不过微醺誓不罢休;梁启超生病也挡不住喝酒,不喝点酒全无精神头。高人自有高人一等的本事,只听说蔡、梁好酒,却从未有他们喝酒误事的传闻。听说胡适先生也能喝酒,只是平日不喝,偶尔露峥嵘,也是相当了得,有一次喝得酩酊大醉,差点闹出大笑话。在光鲜的一面背后,他们人生的另一面同样精彩,只是我们看到的他们那一面实在光鲜夺目、太过精彩,使人过目不忘。

在山东大学有流传很广的“酒中八仙”,杨振声、赵太侗、梁实秋、闻一多、黄际遇、方令孺、刘本钊、邓仲纯(也有人说是陈季超)。著名作家梁实秋曾经担任山大外语系主任和学校图书馆馆长,离开山大之后,他写了一篇名为《酒中八仙——记青岛旧游》的文章,记述此事。文中写道:“青岛是一个好地方,背山面海,冬暖夏凉,有整洁宽敞的市容,有东亚最佳的浴场,最宜于安家。唯一的缺憾是缺少文化背景,情调稍嫌枯燥。故每逢周末,辄聚于酒楼,得放浪形骸之乐。”据说这帮人不仅周末聚,一般是三天一小聚,五天一大喝,猜拳行令,吆三喝四,妙语连珠,三十斤一坛的浙江花雕,用不了多时就已饮尽。他们不仅在本地喝,还时常远征济南找齐鲁大学的好酒之友一比高低,最远处到了南京、北京,酒后吐狂言,要“酒压胶济一带,拳打南北二京”。梁实秋说因“情调稍嫌枯燥”,这成了他们喝酒的理由。其实喝酒本不需要理由,已经说之,那就姑妄听之吧。

当然,杨振声等人决不仅仅是

“酒中八仙”,做学问、写文章、管理大学,皆是好手。杨振声是校长,理顺校务可与其的母校校长蔡元培比肩,曾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,抗战胜利后全权负责北京大学的回迁筹备事宜,毫无疏漏,顺利班师回京。闻一多担任文学院院长、中文系主任,被称为集诗人、学者、民主斗士于一身的著名教授。黄际遇是理学院院长,留学日本、美国著名大学,曾任河南大学校长、河南省教育厅长。赵太侗先后两度担任山大校长,理校期间带给学校两度办学辉煌。梁实秋自不必多说,大名鼎鼎,超然于外。还有散文家、诗人方令孺,书法家、金石学研究大家刘本钊,哪一个不是学术界立得住、顶得上的牛人或行政事务管理的内行?邓仲纯的父亲是陈独秀的老师,在“酒中八仙”陆续离开后,邓仲纯在国立山东大学重新筑起一个喝酒的圈子,有赵太侗、老舍、赵孚侯、洪深、台静农、叶石荪、萧涤非等,被称为“后酒中八仙”。抗战开始,山东大学因内迁不力,被教育部责令暂停办学,师生员工各奔前程,直至1946年才得以恢复办学。经历太多,过往不再,“酒中八仙”和“后酒中八仙”,成为山大人历久弥新的谈资。

文人已经破圈,旧时文人所留下的这些旧事,听上去还是很有意思的,是一个时代一个群体过往踩在脚下的印记。留着这些脚印,或许还能听到步履蹒跚往前跋涉的脚步声,体味蔡元培、胡适、马寅初等大咖的温情,享受杨振声、赵太侗等山大“酒中八仙”和“后酒中八仙”的不亦乐乎,感悟那个时代、那些文人的苦中作乐。

(本文作者为高级记者、媒体从业者)

□王玉林

宋元丰元年正月,苏轼知徐州,写有《送李公恕赴阙》,诗中:“世上小儿多忌讳,独能容我真贤豪。为我买田临汶水,逝将归去诛蓬蒿。安能终老尘土下,俯仰随人如桔槔。”南宋施元之注:“李公恕时为京东转运判官,召赴阙。公恕一再持节山东,子由亦有诗送行曰:‘幸公四年持使节,按行千里长相见。’”

自出任杭州通判之后,苏轼转岗如走马灯。熙宁八年(1075),四十岁,自杭州改知密州;熙宁十年(1077),四十二岁,自密州改知徐州;元丰二年(1079),四十四岁,自徐州改知湖州(是年乌台诗案发,后被贬黄州)。这期间,苏轼曾因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,后又作诗讽刺新法,受到新党全面打压。这是此诗写作的历史背景。这首诗的前半部分,苏轼吐槽,大致不过遇人不淑、怀才不遇之类的牢骚。如此重大的政治压力下,尽管有着“君为使者见不问,反更对饮持双螯”的睥睨,还是使他倦怠,有了退隐的思想,惹不起,我还躲不起?因此写道:“为我买田临汶水,逝将归去诛蓬蒿。”

苏轼退隐,为什么首选汶阳田呢?我想他应该有多方面的考量。

首先,汶阳田哺育了大汶口文化和泰山文化。大汶口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文化现象,是史前文明光辉灿烂的代表;泰山文化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局部缩影。“千金买邻,八百买舍”,文化人选择这样的文化环境,自在情理之中。

其次,作为早期中华农业文明的地标,汶阳田被称为膏腴之地,自古“齐鲁必争汶阳田”。唐代诗人张继就有“齐宋伤心地,频年此用兵。女停襄邑杼,农废汶阳耕”的诗句,以此为例证,为标志,控诉“安史之乱”毁灭耕织的酷烈。刘长卿诗中则写道:“方收汉家俸,独向汶阳田。”像汉代一样,唐代朝廷也把汶阳田的税收作为百官俸禄的重要来源。这就佐证了汶阳田的富庶,在此买田安家,不愁冻馁。

再者,苏轼身边的挚友也不断地唠叨汶阳田,“苏门学士”黄庭坚就写有“匏从曲沃来,管是汶阳有。土性本高明,天材更浑厚”,曲沃的葫芦、汶阳的竹子,是制作笙的良好材质,《国语》曰:“匏竹利制,笙以匏竹合而成声,古者选笙,必曲沃之匏,汶阳之竹。”还有一位晁补之,也在他耳边聒噪:“殷勤趵突溪中水,相送扁舟向汶阳。”以浪漫的情怀,向浪漫主义者极力推介涿源趵突泉和大汶河水道之畅通。苏轼的官场前辈王禹偁也曾问候朋友:“汶水年来涨绿波,先生居此兴如何?”并期望“重入玉堂非所望,汶阳田好欲归耕”,表达了对汶阳田的热情向往。

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,周围宵小的嫉贤妒能、诬赖刁告,皇帝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……几十年的从政经验,告诉他为官的风险系数之高,全身而退之难,因此,苏轼和弟弟苏辙解甲归田的心思非常强烈。再加上兄弟二人身边跟随游宦的家人生齿日繁,侍从日渐增多,为长久计,急需购置地产,于是,他便对此作了多种掂对、多种设想、多种尝试,如“买田荆南”“置产许昌”“买田阳羨吾将老,从来只为溪水好”“十年归梦寄西风,此去真为田舍翁”。遗憾的是,前期的房产梦,此时几乎变成了热烈的白日梦。

真正做到,是在贬谪黄州之后,苏轼在《东坡八首(并叙)》中说:“余至黄州二年,日以困匮。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,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,使得躬耕其中。”又在《与子安兄》中说:“近于城中得荒地数十亩,躬耕其中。作草屋数间,谓之东坡雪堂。种蔬菜接果,聊以忘老。”但好景不长,随着不断地被流放,苏轼的如意算盘九九归零。

最可笑的一次是在阳羨置田,赔了夫人又折兵。“东坡卜居阳羨,士子邵民瞻从其学,为东坡买一宅,需款五百缗,东坡倾囊购置。入住当晚,与邵散步村落,闻一老妇哭,问之,答曰:‘吾相传百年,子不肖,卖与他人,今日搬出,不舍而哭也。’东坡怆然,问其所居,正是所买也,当即焚券归之。自是遂还颍陵,不复置宅。”我甚至有点不厚道地想,这蛮像做局挖的一个坑,抓住了苏轼的仁善仗义和为人从不设防的软肋。

苏轼虽然最终未能“买田临汶水”,与汶阳田失之交臂,但他对汶阳田的青睐和厚爱,至今令汶阳田人为之自豪。苏轼没有到过泰山的记载,但他在《送杨杰》诗中吟道:“天门夜上宾出日,万里红波半天赤。归来平地看跳丸,一点黄金铸秋橘……”杨杰听了,不由击掌赞叹,惊愕于苏轼奇妙的神游八极。倘若苏轼当年真的卜居汶阳田,他是否也同杜甫一样,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?我看,那是必须的!

(本文作者为中华泰山文库编审、泰山文化研究学者)

【读史札记】

苏轼为何欲『买田临汶水』